

唐山文史资料

第八辑

文化史料专辑之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0年9月

唐山文史资料

第八辑

文化史料专辑之二

政协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唐山工程技术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98 字数17.4万 印数2500册

冀出内刊字JN—2010

主 编
魏兆环

特邀编辑
长 正
于 英
宋瑞夫

责任编辑
奥 天
杨季先

目 录

- 思绪纷飞话当年——《节振国》创作、演出琐忆**……李国昌 (1)
- 从为兵服务到为民公演
- 唐山市京剧团的历史行踪 ……………郭文学 (17)
- 徐荣奎在唐山** ……………于 英 (29)
- 冀东区党委文艺工作团简史** ……………景 新 (34)
- 乐亭大鼓的形成与发展概略** ……………王树彬 (59)
- 我心目中的靳文然** ……………韩 溪 (68)
- 乐亭大鼓书艺人丁韵清** ……………兰玉芬 (80)
- 唐剧的脚印** ……………韩 溪 (87)
- “凤凰”飞进中南海
- 唐山市音协“七·二八”业余合唱团
- 进京演出前前后后 ……………石金城 (102)
- 著名国画家秦仲文事略** ……………陆占山 (115)
- 群芳堂随笔** ……………蒋雨浓 遗作 (129)
- 《群芳堂随笔》絮语 ……………刘达成 (138)
- 情炽报国切 迹短流辉长**
- 著名剧作家、散文家宋之的 ……………董宝莹 (140)
- 著名电影艺术家——沙蒙** ……………李作仁 (150)
- 当代著名指挥家李德伦** ……………张国才 (155)

古筝大师娄树华	李作仁 刘永灿 娄学文	(167)
北方昆弋猴戏表演艺术家郝振基	孟昭林	(174)
昆坛翘楚王益友	孟昭林	(180)
贾兰坡教授	吴尔亮	(185)
从地下考古资料中看唐山历史发展痕迹		
.....	崔良富 陈萍	(191)
天宫寺塔	董宝莹	(198)
流传于唐山的民间谚语	鲁保中 整理	(203)

思绪纷飞话当年

《节振国》创作、演出琐忆

李国昌

1964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是当时京剧界乃至整个戏曲界的一大盛会。在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上，全国有19个省、市的29个京剧院、团，32个剧目参加了演出，真可谓名家荟萃，好戏连台。这次活动，对推动京剧艺术的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观摩演出中，唐山市京剧团的现代京剧《节振国》一炮打响。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陆定一、谭震林、邓子恢、郭沫若等先后观看了演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戏剧报》等14种报刊，相继刊登了评介、图片46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作了录音与实况转播。田汉、张光年、冯牧等文艺专家对《节》剧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文化部召开的剧作家座谈会上，编剧于英同志在会上介绍了《节》剧的创作经验。大会后期，全国各地28个兄弟剧团三百余人，其中包括全国著名的京剧演员高盛麟、李和曾、张云溪、张存华等有组织地学演了《节》剧。观摩演出后，剧团留京公演，并专程到北戴河为华北地区地、市委书记会议演出。9月8日重返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后，剧团又带着《节》

剧，分赴南京、上海、济南、青岛等地演出。此外，评剧、川剧、淮剧、豫剧、老调等剧种还对《节》剧进行了移植。7月，《节》剧剧本在《剧本》月刊发表。嗣后，戏剧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还先后出版了单行本和附曲谱的演出本。一时间，《节》剧在我国戏曲界引起了“轰动效应”。

回想《节》剧的创作和演出过程，这里要提到景新同志，他于1958年在京剧团任团长期间，便抓了这出戏的编排，并带领剧团赴天津（当时河北省的省会）参加了国庆10周年的献礼演出。在他的支持下对《节》剧进行了多次修改。他对《节》剧最初的创作和排演付出了很多心血。

1960年5月，我调到京剧团任支部书记兼团长，开始接触《节》剧的修改、排练和演出。26年来，我时常想起它十多次加工提高的前前后后，特别是面对今天全国戏曲界不景气的现象，更不免时时追忆彼时彼事，以及由它引出的思索……。

剧本主题的提炼与舞台艺术雕琢

节振国是开滦赵各庄矿的井下支柱工人。1938年，开滦煤矿工人不堪忍受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在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发动了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节振国是赵各庄矿罢工斗争的领导人之一，任罢工纠察队队长。在罢工斗争中，节振国站在第一线，嫉恶如仇，敢于斗争，令鬼子、汉奸闻而生畏。在以后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的日子里，节振国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打日寇、锄汉奸，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成为当时名闻冀东，为广大人民群众传颂的传奇式的抗日民族英雄。出于对英雄的怀念，把节振国的事迹搬上舞台是很多文艺工作者的宿愿。早在1949年初，冀东区党委文工团的吴岚、潮清等同志便着手搜集素材，进行创作。后来，又按照冀东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张达同志的指示，到赵各庄矿创作了歌剧《节振国》，该剧本被中央歌剧院索走经过修改、采排后不知何因被搁置起来。

1958年在“大搞现代戏”的启迪下，京剧团的耿苓秋、宋耀田等同志，曾根据王火等同志写的《赤胆忠心》中节振国刀劈鬼子的故事写了一折小戏，因故没有付诸排练。同年12月，在景新同志的倡议下，于英同志去赵各庄矿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在矿俱乐部缪连合同志的大力协助下，时间不长就结构成一个大戏。1958年底至1959年初，剧团对于英同志创作的剧本《节振国》进行了排练和演出，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开滦矿工们的欢迎。1959年唐山京剧团赴省会天津，参加庆祝建国10周年献礼演出，在演出献礼剧目《赵氏孤儿》的同时，《节振国》也作了征求意见的演出。演出之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在不断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作者也不断进行修改。当时的剧本，主要是串联故事，剧情偏重于惊险曲折、火炽热闹，把一些传奇性强的事件如刀劈鬼子兵、化装摸炮楼、酒馆掏夏连风、真假李逵山等都一古脑地堆砌在舞台上。虽然场面“火爆”，演出“叫座”，但全剧头绪繁多，主题不鲜明，节振国这个抗日民族英雄，有些草莽英雄的味道，党的领导作用体现得不够有力。

在那以后的6年演出实践中，虽然对剧本不断地进行修改，但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挖挖补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3年。

1963年下半年，对该剧进行大修改的工作出现了契机。那就是，1964年省和全国要搞京剧现代戏会演，唐山文化局确定拿《节振国》参加省会演。于是请于英同志再次修改剧本。当时很多同志都觉得这个戏有两截子的感觉，四场前是闹罢工，四场后是抗日，对这个问题，总也没有想出很好的解决办法。

1963年冬天的一天下午，文化局副局长张静波、戏研室于英同志和我一起议论《节》剧的修改问题。大家分析，节振国是个抗日时期的人物，剧本应体现当时历史面貌，同时又要有新的时代意义。当时，国际上掀起一股和平演变的逆流，突出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

命，有其特殊意义。我们认为《节》剧的素材，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便进一步分析研究了《节》剧修改的思想脉络：全剧应写出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从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的必然趋势，以及节振国这个人物怎样由自发到自觉的思想发展变化。这次对《节》剧修改的议论，对《节》剧主题思想的提炼，应该说是一次突破，也是一次对《节》剧认识上的升华和飞跃。

经过反复研究、探讨、修改，《节》剧的主题越来越鲜明了，写节振国由一个普通工人，如何在党的教育下逐步成长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这是时代赋予《节》剧的新的意义，新的主题。

我们谈《节》剧的修改，在主题思想的提炼与升华上，确实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节》剧在导、表演、唱腔、舞美等方面的创作经验，如果能认真总结一下，同样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今天，对我们如何排好、演好一些剧目，也许更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

对于《节振国》这出戏，团里的所有同志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偏爱情绪，对它的反复加工修改，大家始终是满腔热情、严肃认真的。可是由于在艺术上的理解与认识的差异，对一些具体艺术问题的处理，往往就出现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这些问题，再具体点说，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是最初京剧搞现代戏所必然会面临且急待解决的问题。即：做到既是京剧、又是现代戏，不能搞成旧瓶装新酒或话剧加唱。

为了把《节》剧搞得更好，在不断修改剧本的同时，我们下大力量充实了《节》剧的艺术创作班子。成立由张先猷任执行导演，有孙鸣昆、任喜春、王长山、于英、徐荣奎、凌云霄等人参加的导演班子。这些同志中，有的具有系统的文艺理论与导演知识，有的具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唱腔、音乐设计上由徐荣奎、韩溪、任喜春、卢贵和、崇松启、王久山等同志参加，他们中，有谙熟京剧唱腔音乐的老艺术家，也有新戏曲音乐工作者。

舞台美术方面，既有自始至终担任《节》剧舞美设计的马福庆同志，也曾请过市话剧团刘兴学和省里的龚礼铭、王明喜同志参加设计。形成一个配合默契的创作群体。

在排练过程中，我们还专门请了一些专家进行指导。如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李章同志，就曾给我们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中国京剧院的京剧音乐专家刘吉典同志也曾给予很好的指点。

这个创作群体有一个宗旨，就是服从于剧本主题的需要，服从于剧中人物性格的需要，由导演统一构思。由于《节》剧的不断修改和排演，有些场次已经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现在，从新的主题需要出发，如何实现上面说到的宗旨，就不可避免地遇到忍痛割爱的情况。比如原来有节振国的爱人刘玉兰被捕后在狱中的一场戏，既写了夏连凤的叛徒嘴脸，又写了刘玉兰英勇不屈的斗争。刘玉兰挥洒淋漓的大段唱，每次演出都有较好的效果，可它与整个戏的主题关系不紧密，加工修改过程中，忍痛把它砍掉了。再如酒馆掏夏连凤的戏，演出效果也很强烈，但由于对节振国这个人物性格的发展关系不大，也全部删除。还有戏开场时冯老顺的妻子因生活所迫卖被子的一段唱，有声有情，效果很好，但保留它，显得戏的“皮儿”太厚，进入戏的矛盾太慢，到北京后，还是忍痛割舍掉了。而“一斗大洋白花”的唱段，却是揭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对节振国的诱惑收买，与主题紧密相关，直到去天津才又加上的。

京剧现代戏要尊重传统，这是其一；演得象现代人，这是其二，做到二者的统一很不容易。《节》剧的最初排练，有人曾经半开玩笑地总结了这样几句话：舞台调度上，见高就上；唱念上，“激情嚷嚷”；布景上，石头破墙……云云。这些话虽不无玩笑意味，确也道出了《节》剧当初排练时的实际情况。

执行导演张先猷同志对《节》剧的艺术处理曾经提出，舞台上要有生活的实感和革命的激情。而《节》剧也确实做到了不断

从生活中提炼，而不是单纯从传统出发。群策群力，献计献策，发扬艺术民主，以达到艺术上的完美，也是《节》剧当时修改、排演的特点之一。去天津会演前，剧团集中在唐山机车车辆工厂俱乐部排练。当时，全团所有演职人员都坐在台下，认真地观看台上的排练，并且每个人都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写在纸条上，一天中就收到过近百条意见，这些意见对《节》剧的排练起到过很大的作用。如工贼马老三的一个上场，就先后设计过七组动作，反复敲定，才确定成现在这个样子。再比如，二场“抢煤场”和全剧结束前的开打，武戏研究小组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实践，下了很大功夫，才提炼出既利用京剧传统戏中的武打套子，又符合现实生活中此时此地的客观情景。象杨小霖愤举坑道木砸向日寇的动作，就收到非常强烈的艺术效果。

群策群力，也体现在大家同心协力，完成统一的艺术构思。执行导演张先猷同志对京剧表演程式并不十分熟悉，但他从导演的总体构思出发，对具体场次、片断，甚至具体动作提出要求，大家根据导演的总体要求去思索、设计、完成。不行就改，如节振国刀劈鬼子时，演员最初用武松的背刀式亮相，导演组觉得不妥，大家开会研究，并由此生发开来，用一整夜的时间，设计出四十八个动作，表现节振国在各种场面中的风采。以此不难看出，要真正做到一出戏的成功，决非少数人的作用，而是群体智慧的结晶。

至于我们团已故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徐荣奎同志在《节》剧唱腔的设计上所做出的贡献，全团同志也包括社会上的专家和群众，都是齐声称赞，有口皆碑的。剧中，节振国的所有唱腔，全部由徐荣奎同志设计，其余人物的大部分唱腔设计，也是出自徐荣奎同志之手。在唱腔的革新创造上，他有其独到之处。比如节振国在杨大娘家养伤时的一大段唱腔，他设计为前“西皮”后“二黄”二者融为一体，既继承了传统，又有出新。“老人家怀悲愤”的唱段，还吸收了吹腔的旋律。再如，杨小霖听说母亲遇害

后，急于去报仇，节振国劝其从大局出发，不要莽撞行事，可是他自己的心情也很悲痛。这时，徐荣奎同志在唱腔中大胆地使用了在现代戏中很少使用的“反西皮”。我们今天谈论《节》剧的成就，离不开徐荣奎这位对工作极端负责而又才华横溢的老艺术家的贡献。在京剧现代戏唱腔的革新与创造上，徐荣奎同志可以说是一位开拓者、先行者，这方面，非寥寥数语能说得清楚。

1964年在津参加河北省会演时，中央戏曲研究院黄叶绿等八位同志看完《节》剧的演出后，专门在剧团里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他们说，看了这个戏后很兴奋，觉得剧团有自己的想法，有统一的构思，舞台上也体现出了这些想法。认为《节》剧在各个方面都能做到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统一构思，这在当时，虽然感到欣慰，但并未全面深刻地理解。而真正理解这些话的意义，真正认识《节》剧在艺术上所做出的贡献和价值，却是在若干年后的今天。

省会演结束后，我们得到《节》剧要到北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消息，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责任也更大了。就在那时，上级领导给了我们很大支持和鼓励。1964年春，当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远千里同志，省文化局副局长连衡、李伦同志，艺术处长于建中同志都曾专程来唐指导。为了排好《节》剧，在去北京前的一段时间内，全团同志集中在团里吃住。当时的文化局局长罗楠同志到剧团蹲点，经常通宵达旦地和剧团的同志们一起工作。白芸市长多次到剧团看望鼓励大家。还指示我们每天给大家增加两毛钱的伙食补贴。两毛钱，在今天只够买一只冰棍，可在当时，已经是非常特殊的待遇了。临去北京前，市委书记杨远同志在他的办公室里召开座谈会，有白芸市长、省文化局副局长李伦、市文化局局长罗楠和我参加。杨远书记分析了节振国这个人物的时代背景，指出当时的斗争形势，并谈到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去北京要“老实汇报，虚心学习”。领导对《节》剧的关心，在若干年后的今天，想起来仍然那么亲切。

从《节》剧最初的本子，到北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小的修改不算，涉及结构上大的修改有十五次之多。它立在舞台上凝聚了集体的智慧。其中，既有领导的关怀，专家的指导，群众呕心沥血的创作，也包括广大观众的热心支持。应该说，《节》剧是大家齐心协力浇灌出的京剧现代戏之花。

在京的日日夜夜

唐山京剧团《节振国》剧组一行85人在省文化局李伦副局长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子敬等同志的带领下，于1964年6月4日进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登上火车后，不能不想到临进京前的一些情况。

进京前一个月，在天津参加会演时，就得知进京参加观摩演出大会，整个河北省只能去一台戏，而当时在省会演中，张家口参演的《八一风暴》，石家庄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天津的《六号门》，还有咱们的《节振国》，反响都不错，呼声都很高，且进京的“竞赛意识”都很强。如何能争得这一进京名额，得到这份光荣，剧团上上下下，真是拧成一股劲，那种精神，那种集体荣誉感，至今想起来仍令人感动。

记得在天津演出那天，不上场的同志，几乎都站在了舞台两侧，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台上的演出。大家屏住呼吸，连有人大声喘气都会遭到白眼，生怕影响了舞台上的效果。

转天，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看完演出之后上台接见演员，并当场表了态，说戏演得不错，今年6月份北京现代戏会演你们可以去！

可是，直到我们离津返唐时，仍没有接到省的正式通知。说实话，忐忑不安哪。盼哪盼，终于在返唐后才盼到了去京参加会演的正式通知，一颗吊在嗓子眼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当时是我去省领到这个通知的，当我返唐在演出后台把这个消息向大家宣布时，全团顿时沸腾了，大家把我架起来一扔老

高！

1964年6月4日，我们剧团带着《节振国》，也可以说带着全市人民的嘱托去北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唐山劳动日报》为京剧团进京参加盛会专门发表了社论。在北京我们住了整整一百天。26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当时，全国正处在大抓阶级斗争的大气候下，《兵临城下》等某些作品已受到批判。观摩演出大会期间，时有使人紧张的消息传来。有的剧目中主要角色，特别是剧中党的领导人物由什么人扮演也受到个别人的质问。我们当时的心也都揪到了嗓子眼，唯恐哪里会出现问题。如果是由于我们注意不到出点问题，担责任事小，如何向家乡父老交代啊！因此，到了北京之后，除每天认真地观摩外，我们仍然在酌词斟句，修改剧本，加工排练。就连当时在京治眼病的市委常委，副市长贾同海同志也不分昼夜地和我们一起工作。如剧本中节振国有这样一句唱：“……战乱年家家血泪流不尽……”，进京后，我们反复推敲，改成了“战乱年家家都有仇和恨”。现在看，这句词改得并非没有道理，但当时，确实是仅从觉得它“不硬”、“没劲”这个角度出发改的。

6月4日进京，7月2日演出，这一段时间，《节》剧仍然在不断修改的过程中。

进京后，我们住在解放军后勤学院，受到了热情接待。到演出前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加工排练工作都是在后勤学院礼堂进行的。不知怎的，认为《节》剧是出好戏的消息不胫而走。新闻界，戏剧界，几乎每天都有人来观看我们的排练。记得一天，当时的全国剧协主席田汉同志来看望剧团，他从头到尾看完了全剧排练后，对我们说，我听说了，你们唐山这个小地方出了台好戏，祝贺你们。

7月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所有参加观摩演出大会的同志聆听了彭真同志所作的以京剧革命为题的报告之后，《节》剧连夜装台彩排。

7月2日，《节振国》在首都工人俱乐部进行了首场演出。由于《节》剧中写了1938年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英国代办处的官员很敏感，所以首场演出时他们就买票去看了戏。当时我们还为剧中“英国毛子”的名词有过一番小小的思虑。现在想起来不禁哑然失笑。

演出的第三天，江青也去看了戏，她那时是以中央首长的身份去的，地位特殊，声名显赫，我们都很紧张。我分工在后台负责保卫，罗楠局长在前边接待。江青看戏过程中，就剧本、化妆、表演、唱腔等谈了几条意见。罗楠局长还认真地一一记在了演出说明书上，并逐条向我们作了认真传达。对江青的这些意见，说实在话，当时我们是认真对待了的，这是历史。

北京的演出取得成功。在首都舞台，甚至全国戏剧界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家对《节振国》的演出纷纷喝采。《人民日报》先后发了两篇评论文章，《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天津日报》、《河北日报》等也都发了评论文章。《剧本》月刊、《戏剧报》，甚至《新华月报》也都发了文章和照片。追着采访，报道的记者络绎不绝，使我们应接不暇。全国著名的速写家阿老同志追到后台，为《节》剧画了一组速写，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当时的情况，真有“一曲《节》剧遍京城”之势！

在京期间，观摩演出了5场。演出结束后，文化部决定在参演的32个剧目中选6台戏在京公演，《节》剧列在其中。当时留在北京公演的还有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山东的《奇袭白虎团》、《红嫂》，哈尔滨的《自有后来人》，河南的《红管家》。由观摩演出到公演，《节振国》曾在人民大会堂、政协礼堂、民族宫礼堂、首都工人俱乐部、首都剧场、人民剧场、天桥剧场、五道口俱乐部等几个主要剧场进行演出。二次进京时还进中南海怀仁堂演出，真是盛况空前。

在政协礼堂演出时，周文彬同志的妹妹观看了演出。周彬文

同志在《节》剧所反映的这段历史中，曾是当时唐山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周文彬的妹妹由朝鲜来中国，听说了《节》剧的演出，特意去观看，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激动得泪流满面，还到台上会见剧组的同志们，并和大家合影留念，可惜这些照片在“文革”中遗失了。

在京演出期间，还有一件非常值得怀念的事。6月5日，观摩演出大会开幕那天，在民族宫剧场，我们刚刚坐定，周总理就到了。总理的座位正好在我后边，两边分别是陆定一和茅盾。看到总理，全场都沸腾了，记者们也都围了上来拍照，总理说，你们干什么？看我还是看戏？他要工作人员维持好秩序，不要影响大家看戏。

我当时又紧张又兴奋，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面向总理笑着，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总理问我是哪儿的，我忙回答：唐山京剧团的。总理略一思索说：“《节振国》？好！等着看你们的演出”。

在京期间，我四次幸福地见到周总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人民剧场，看江西团演出的《李双双》、《大渡河》。总理来晚了，今天是公演，卖票，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见总理到了，拿着票去请，总理说：我们买了票了，该坐哪儿坐哪儿。还有一次，是看李慧芳演出《洪湖赤卫队》，总理也是因事来晚了。进场后就悄悄坐在了后排，唯恐耽误大家看演出，直到中间休息才坐到前边去。

观摩演出结束时，周总理亲自为大会颁发纪念状，我代表剧团上台和总理握手时，激动地说：“请总理看我们的戏”，周总理看着我说“节振国！”总理的脑筋太好使了！后来我们返回北京在怀仁堂演出，总理因病住院，没看成我们的戏，我们全团的同志都为此深感遗憾。

更难忘的是，7月9日这一天，在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一起接见了参加观摩演出的各代表

团，并合影留念。毛主席穿的是白上衣，灰裤，布底鞋，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老人家上衣的后背上有一块补丁，真是感动之极。

不巧的是，随团进京的唐山市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主任刘经武同志刚好返回唐山向市委汇报《节》剧在京演出的情况，没有赶上这次接见，至今仍懊悔不已。

9月份，剧团二次进京，朱德委员长等好多领导同志观看了《节振国》。那天，康生也去了，看到第三场时，派人找剧团领导，罗楠局长和我去了会客室，我们感到坐立不安，毕恭毕敬的认真听了康生的意见。康生首先问了演员的政治情况和剧本创作过程，指责《节》剧正面人物的化妆有问题，党代表化了个印度胡子，腿上扎的象上海拉黄包车的……，他还说，他对这次罢工情况有所了解……云云。在谈的过程中，中间休息的时间到了。朱德委员长来到休息厅，高兴地对我们说：“不错呀！好戏！”我们问康生还有什么指示，康生说，我没看完，以后有意见让省委转达给你们。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急急忙忙退了出来，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还有一件值得提及的事，《节》剧由排练伊始，直到1964年进津演出前的几年中，节振国这一角色始终是由徐荣奎同志扮演的，他为《节》剧唱腔的设计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可是，1964年3月份去津前，他突然患心肌梗塞，不能参加演出，换了演员。说实在的，一辈子也难得到的机会和荣誉失去了，演员心里难受啊！罗楠同志是个非常体谅人的人，是很会作人的工作的领导，她没有忘记徐荣奎对《节》剧做出的贡献，时时想着为《节》剧出过力的同志。进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定下来后，她马上打电话到唐山，将徐荣奎同志接到北京，领导接见时还特意将他安排到朱德委员长身边，使他也充分享受了《节》剧带来的幸福和荣誉，感动得这位老同志热泪盈眶，几年后还常常提及此事。

我们由6月4日进京，观摩演出结束后，又被留在北京一个